

十八世紀五十年代葡萄牙驅逐耶穌會士緣起研究

陳麗華*

摘要 對於龐巴爾侯爵驅逐耶穌會的歷史事件，學界往往將其緣起歸結為堂·若澤一世的遇刺，或者是為了保護其在葡屬巴西的壟斷公司，最後奪取耶穌會士在葡屬巴西的巨額財富。實際上，通過對眾多史料的分析，我們得知該事件是龐巴爾侯爵在1750年的《邊界條約》、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1758年的堂·若澤一世國王遇刺案的共同推動下所作出的決策，是對葡萄牙國內外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必然調整。

關鍵詞 堂·若澤一世；龐巴爾侯爵；《邊界條約》；里斯本大地震；耶穌會驅逐事件

引言

在葡萄牙的歷史上，發生過耶穌會士被驅逐的重要事件。1759至1773年，龐巴爾侯爵（Marquês de Pombal, 1699-1782）¹在堂·若澤一世（D. José I, 1714-1777）的支持下，將葡萄牙及其海外屬地內的耶穌會神父全部驅逐出境。一直以來，國際學術界對於該事件的背景研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二十世紀前，該事件只佔據耶穌會編年史中的一小部分。二十世紀初，隨着龐巴爾及堂·若澤一世政治研究熱潮的來臨，學者們對驅逐耶穌會事件進行了比較基礎的研究。自1938年始，瑟拉芬·雷依奇（Serafim Leite）陸續在其作品中提出，定居者與耶穌會間圍繞着“印第安人的自由”而產生的矛盾，是耶穌會被驅逐的基調，也是其被驅逐的主要原因。² 1943年，佩德羅·卡爾蒙（Pedro Calmon）提出：“耶穌會的存在是龐巴爾侯爵改革的主要障礙。”³ 他認為，驅逐耶穌會即代表新的政治意識形態及模式的誕生。1952年，若熱·博爾熱斯·德·馬塞多（Jorge Borges de Macedo）首次在其著作⁴提出，在考慮龐巴爾反耶穌會的問題時，需

要將政治、經濟及當時的社會狀況擺在首位，而反耶穌會措施形成的背景必須與當時的經濟狀況相聯繫。⁵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學界在耶穌會被驅逐因素的探討中，重新提出了經濟動機說。1970年，達里爾·奧爾登（Dauril Alden）在《巴西耶穌會的被驅逐：經濟方面的原因》一文中專門分析了經濟因素對於耶穌會被驅逐的影響。⁶ 1983年，曼努埃爾·安圖內斯（Manuel Antunes）在其作品《龐巴爾侯爵與耶穌會》中認為，驅逐耶穌會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其中摻雜着偶然性、經濟及意識形態的因素。⁷ 心理上的因素當然是虛無縹緲的，但“經濟動機更為明確，耶穌會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擁有許多財產。另一方面，國庫是貧乏的，有時甚至是枯竭的，必須填補。耶穌會士的財產是有吸引力的，所以沒收他們是為了填補國庫的空白”。⁸ 這種觀點得到了葡萄牙歷史學家若澤·愛德華多·弗朗克（José Eduardo Franco）的贊同：“政府希望通過這次沒收，將大量的資本注入國庫，以平衡國家的帳目。”⁹

儘管學界已經對龐巴爾侯爵驅逐耶穌會的因素進行了政治、經濟方面的探討，但是就目前來看，學者們並沒有過多地關注引發該事件

* 陳麗華，暨南大學世界史系碩士，研究方向為葡萄牙及葡屬地區研究；現為中山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世界古代中古史。

一、耶穌會被驅逐的前奏： 亞馬遜的早期局勢及《邊界條約》的簽訂

在討論《邊界條約》與耶穌會被驅逐的事務的關係時，必須先了解耶穌會在條約相關地區——亞馬遜的具體活動狀況。這一點關係到我們如何理解《邊界條約》對於亞馬遜政局及亞馬遜耶穌會的影響。

耶穌會在亞馬遜地區傳教的歷史可追溯至十六世紀中期。該會不僅幫助殖民者探索了亞馬遜地區廣袤的土地，也幫助其教化印第安民眾，使其成為葡萄牙統治下的政治順民，甚至也為亞馬遜地區的印第安人建立了歐化的社會制度。但是，耶穌會在亞馬遜的成就也引發了耶穌會與亞馬遜定居者的利益衝突。

這些衝突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面。首先是勞動力衝突。起初葡萄牙王室同意在亞馬遜地區實行印第安勞動力租賃制度。法律規定，耶穌會士、市議會及總督享有對身份卑微的印第安人的定價、分配及租賃權；租賃的時間大約為十年，租期到期之後，印第安人將有權回歸印第安集中村。但是，殖民地居民對於這種規定並不滿意，希望獲得印第安人的永久佔有權。1653年10月，耶穌會領導人物安東尼奧·維艾拉（António Vieira, 1608-1697）回歸亞馬遜之後，耶穌會在亞馬遜地區的權力有所增強。通過宣揚印第安人與黑人間的區別，耶穌會擴充了其在亞馬遜的管轄範圍，以至於葡萄牙政府在1693年確認了耶穌會士享有整個亞馬遜河的南部的管轄權。據估計，在將耶穌會驅逐出亞馬遜之後，法蘭西斯科·沙維爾¹⁰建立了大約62個城市，這些城市都是在前耶穌會村莊的基礎上建立的。¹¹耶穌會在廣闊的土地上從事商業運作，獲取由印第安勞動力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這種經濟和政治利益被一種“人道主義”甚至是虔誠的語言所掩蓋，以粉飾肆無忌憚的商業企圖。這種商業企圖將服務於國王的利益，而不是首先促進印第安人民的利益。因此，“可憐的印第安人的靈魂、身體和財產的絕對壟斷”被歸於耶穌會士。¹²這就為耶穌會與



圖1. 龐巴爾侯爵像（圖片來源：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o de Pombal, Radierung, 1751-1811, 159×101mm, im Bestand der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Leipzig. Siehe auch www.portraitindex.de/documents/obj/33206957。）

產生的其他細節因素。這些因素包括：1750年的《邊界條約》、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以及1758年堂·若澤國王遇刺案。實質上，龐巴爾驅逐耶穌會的事件，是這些事件矛盾累積並最終爆發的結果，因此本文想通過對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前葡萄牙及其主要殖民地葡屬巴西的歷史事件進行具體研究，以期詳細地刻畫出葡萄牙驅逐耶穌會的緣起。

宗教研究

殖民定居者矛盾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除了關於控制土著居民的爭端之外，什一稅的問題也成為耶穌會與當地居民及政府的矛盾焦點。在雷依奇看來，什一稅的豁免是國王給予耶穌會士的重要間接幫助，但也是導致無休止的不和的根源。奧爾登指出，世俗業主對宗教團體財產的抱怨總是與豁免什一稅的問題聯繫在一起。這被認為對業主、徵收什一稅的承包商和王室本身都是極其有害的。¹³ 根據巴西史學家若昂·盧西奧·阿澤維多 (João Lúcio Azevedo, 1855–1933) 的說法，對於耶穌會而言，宗教不需要向國家繳納什一稅，也不用支付大都市的關稅。這理所應當地引發了殖民地居民的厭惡，因為這些價值維持了教會團體的生存，最終引發了特權階級的反對。¹⁴

抱怨和衝突的加劇，使得亞馬遜地區的某些實權人物對於耶穌會的所作所為義憤填膺，由此引發了要求驅逐耶穌會的民眾抗議，其中亞馬遜格勞—帕拉州的法官保羅·達·席爾瓦·努內斯 (Paulo da Silva Nunes) 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位。1724年，努內斯在給海外委員會的請願書當中明確提出：“第一，禁止耶穌會士管理村莊的政治及經濟；第二，恢復1718年的解決辦法；第三，禁止耶穌會會士用通俗語言教化印第安人。”¹⁵ 同時，努內斯在其於1734年發表的備忘錄中，回顧了自身與耶穌會士的爭論，並對耶穌會的教義及行為提出了質疑。

在努內斯的宣傳下，亞馬遜地區反耶穌會的局勢水漲船高，從而為1750年亞馬遜的反耶穌會浪潮奠定了輿論基礎。1750年，葡萄牙與西班牙在《托德西里亞斯條約》(Tratado de Tordesilhas) 的基礎上簽訂了《邊界條約》(Tratado de Madrid, 又名《馬德里條約》)。條約規定，根據山川及河流的走向確定葡屬巴西及西屬墨西哥的邊界線，其中涉及耶穌會傳教團的是“給予我們烏拉圭左岸邊緣上的七個地方：聖·尼古勞 (São Nicolau)、聖·米格爾 (São Miguel)、聖·路易士·貢薩加 (São

Luís Gonzaga)、聖·博爾雅 (São Borja)、聖·洛倫索 (São Lourenço)、聖·若昂 (São João) 和聖·安熱洛 (Santo Ângelo)，我們給予西班牙位於帕拉塔 (Prata) 河左岸的薩克拉門托 (Sacramento) 殖民地。”¹⁶ 1751年，為了條約的順利執行，堂·若澤一世下達了名為“皇家向格勞—帕拉和馬蘭豪州州長法蘭西斯科·沙維爾·德·門東薩·富爾塔多發出的公開和秘密的指示”¹⁷ 的文件。在該指示中，國王對於亞馬遜的重要州格勞—帕拉州境內的耶穌會的行動做了詳細的說明。國王承認耶穌會在亞馬遜地區傳教所做出的貢獻，同時為了維護葡萄牙的國家利益，也對耶穌會的權力做了實質的限制。

該指示發出後，亞馬遜地區的民眾反應不一。定居者歡迎國王的決定，因為印第安人的自由化將解決他們勞動力緊缺的問題；然而耶穌會選擇抵制，因為遵照指示，他們的村莊將面臨被搶奪的風險。他們尤其就指示條款中的第22條進行了辯論，並援引1681年12月21日通過的法律條款進行反駁，即“印第安村莊的管理完全由宗教控制，無論是在精神管理方面，還是在村莊作息及行政方面。”¹⁸ 1755年3月，鑑於行動迫在眉睫，堂·若澤一世決定先發制人，向耶穌會發出強烈警告，“四名因與當局不和及罪行未經證實的耶穌會神父被驅逐出格勞—帕拉及馬蘭豪。這是（葡萄牙王室）第一次對耶穌會使用武力。”¹⁹ 驅逐行動加劇了雙方的矛盾。

雙方的矛盾最終導致了1756年的瓜拉尼人之戰，並給中央政府帶來了嚴重的財政問題。²⁰ 根據有關學者的統計，反對烏拉圭傳教團的戰爭耗費了葡萄牙的資產約為2,600萬克魯扎多 (Cruzado)。²¹ 遺憾的是，即使耗費如此之大，里斯本政府也沒能達到自身目的。由此里斯本與馬德里政府決定對烏拉圭的耶穌會傳教團採取進一步舉措，在烏拉圭的耶穌會村莊內實行政教分離政策，將耶穌會剝離印第安村莊的管理。然而，派遣大量文官或非耶穌會人士進駐該村莊的做法，間接導致了里斯本政府對殖民地的運作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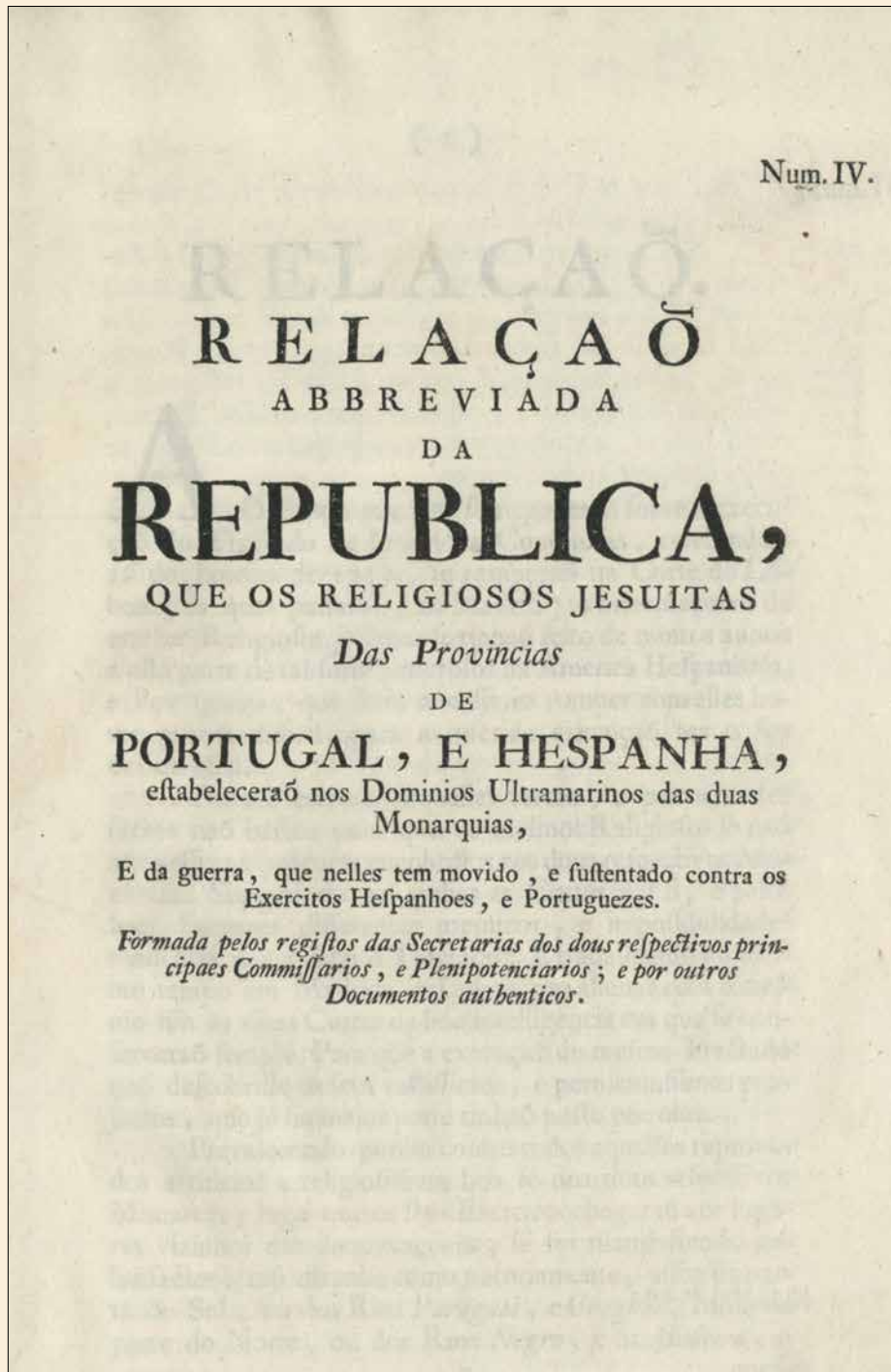


圖 2.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耶穌會神父將在這兩個君主的海外領土上建立共和國的簡要報告》扉頁（圖片來源：“Relação Abbreviada da Republica, que os Religiosos Jesuitas das Provincias de Portugal, e Hespanha, Estabelecerão nos Domínios Ultramarinos das duas Monarchias, e da Guerra que nelles Tem movido, e Sustentado contra os Exercitos Hespanhoes, e Portuguezes; Formado pelos Registos das Secretarias dos dous Respectivos Principaes Commissarios, e Plenipotenciarios; e por Outros Documentos Authenticos”, publicadas em indicação de lugar e data, Lisboa, 17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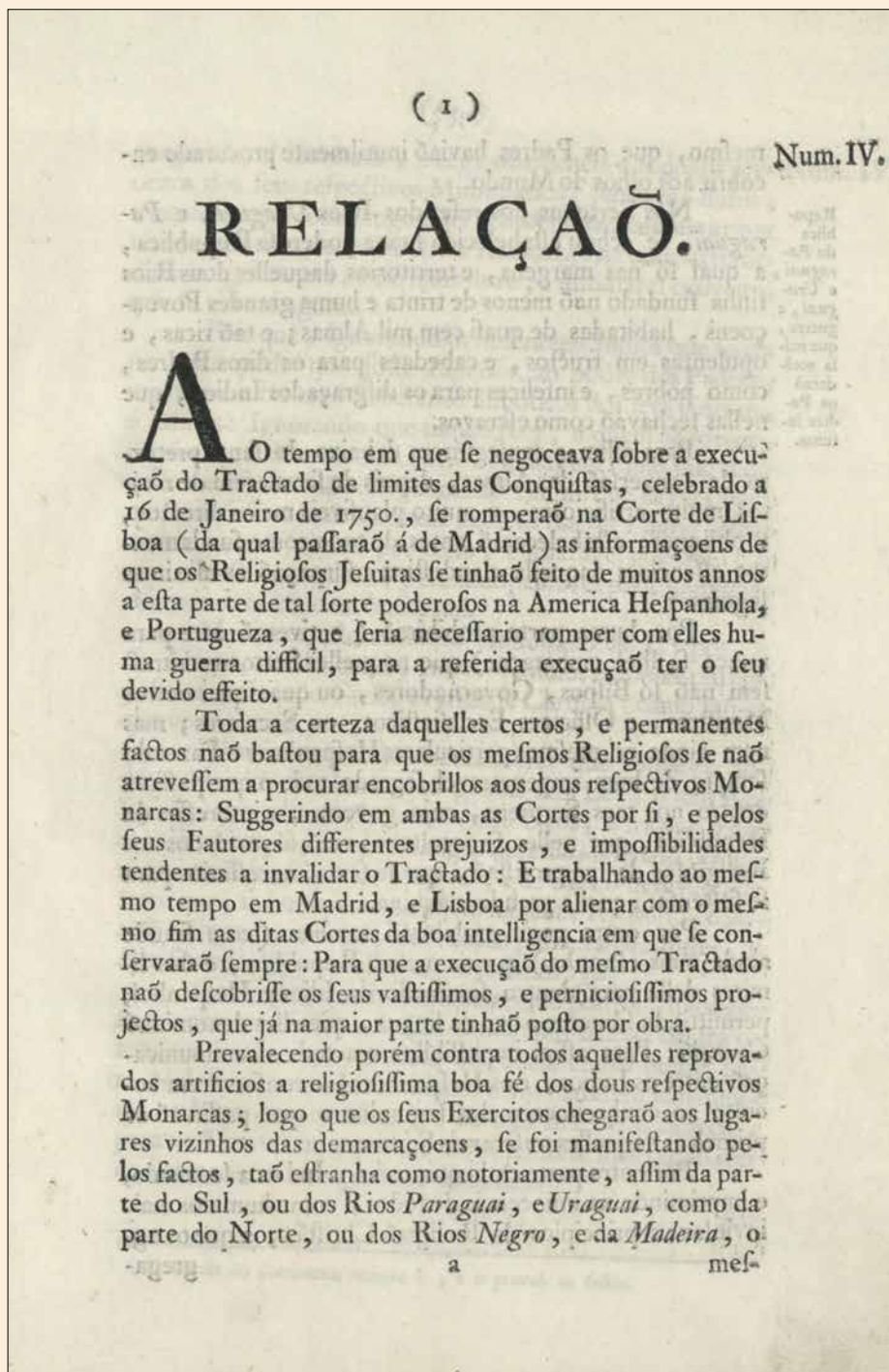


圖3.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耶穌會神父將在這兩個君主的海外領土上建立共和國的簡要報告》正文第一頁（圖片來源：“Relação Abbreviada da Republica, que os Religiosos Jesuitas das Provindas de Portugal, e Hespanha, Estabelecerão nos Domínios Ultramarinos das duas Monarchias, e da Guerra que nelles Tem movido, e Sustentado contra os Exercitos Hespanhoes, e Portugueses; Formado pelos Registos das Secretarias dos dous Respectivos Principaes Commissarios, e Plenipotenciarios; e por Outros Documentos Authenticos”, publicadas com indicação de lugar e data, Lisboa, 17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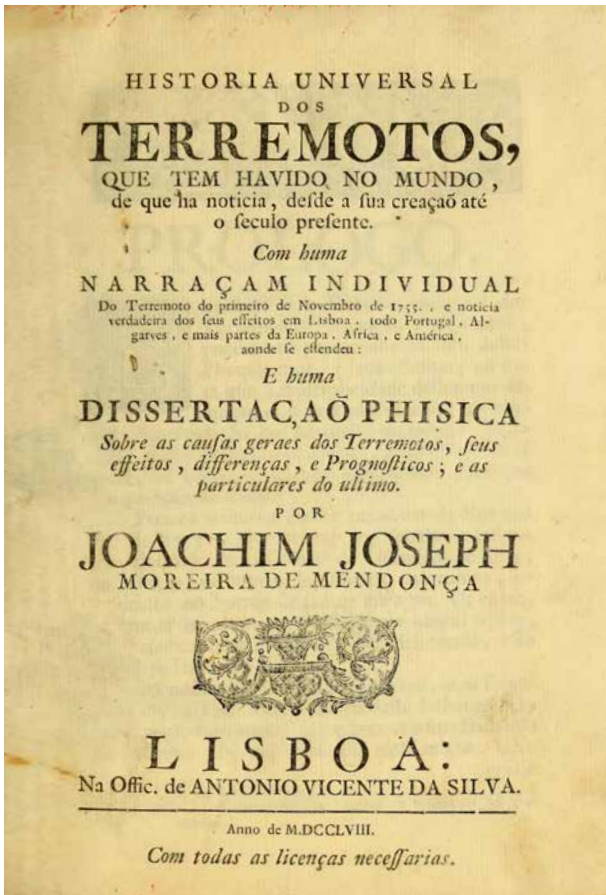


圖 4. 1758 年，若阿欣·若澤·莫雷拉·德·門多薩所作《地震通史》的扉頁，書中有關於里斯本地震的真實描述。（圖片來源：Joaquim José Moreira de Mendonça, *Historia Universal dos Terremotos*, Lisboa: Antonio Vicente de Silva, 1758.）

鑑於耶穌會不肯配合執行條約的事實，龐巴爾侯爵決定，在隨後的終結行動中借題發揮。1757 年 12 月 13 日，葡萄牙國內出版了著名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耶穌會神父將在這兩個君主的海外領土上建立共和國的簡要報告》。該報告開篇即明文提及 1750 年《邊界條約》的影響：“在執行 1750 年 1 月 16 日順利簽訂的《邊界條約》時，里斯本宮廷（不久是馬德里）為耶穌會在西屬及葡屬美洲權霸多年的消息震動了，這是一場艱難的戰爭，我們必須與之決裂，以便達到（西班牙）想要的效果。”²²

另外，從這個報告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龐巴爾侯爵驅逐耶穌會的部分緣由。首先，根據

耶穌會獨立於葡萄牙和西班牙而在亞馬遜地區建立國中之國的歷史事實，龐巴爾侯爵宣揚耶穌會對葡萄牙在亞馬遜的開發增加了無限的阻礙，以致於國家不得不派出最精銳的部隊，以武力接管亞馬遜地區。其次，報告指責耶穌會破壞了民族團結，不僅壟斷民族語言的交流，禁止印第安人使用歐洲語言，規定只能使用神父都通曉的圖皮—瓜拉尼語（Tupí-Guaraní），且在印第安人中間詆毀白人殖民者。再次，報告譴責耶穌會士對於印第安村莊的管理。“耶穌會神父成為印第安人自由、工作及交流的絕對主人，沒有他們，（印第安人）沒有能力做任何事情。”²³最後，報告指責耶穌會分裂國家，妄圖在沒有葡萄牙政府干預的情況下，採取獨立行動，“他們聲稱有權在沒有陛下的大臣及州長干預的情況下，與葡萄牙宮廷主權範圍內的野蠻國家締結條約……更可惡的是，他們按照同樣的條約規定了專屬於王室及臣民的印第安人的最高統治和服務。”²⁴

總體上來說，1750 年的《邊界條約》拉開了葡萄牙驅逐耶穌會士的序幕，“加劇了塞巴斯蒂昂·若澤·德·卡瓦略·依·埃·梅洛（即龐巴爾侯爵）對耶穌會的反抗，其兄弟指責耶穌會士是反叛者及敵人。”²⁵奧爾登認為，《邊界條約》是龐巴爾侯爵及其兄弟為了奪取耶穌會在馬蘭豪及帕拉州壟斷權的一個藉口，因為驅逐耶穌會士便可壟斷該州的煙草、毒品及奴隸貿易。若昂·盧西奧·阿澤維多則認為，《邊界條約》與該時期發生的其他事件聯繫起來，形成了龐巴爾侯爵驅逐耶穌會的原始動機。“《邊界條約》在巴西的執行、格勞—帕拉公司的建立、美洲土著人民的自由宣言等，都發生在地震前龐巴爾政府的統治時期內，它們之間的聯繫構成了整個統治的（歷史）高潮。事實上，這些行動將卡瓦略帶到了與耶穌會的角逐，從那時起，他的整個行政當局都以戰勝他們和安尼奎拉的思想為指導，”²⁶而且，《邊界條約》所引發的《簡要報告》，增加了人們對耶穌會的懷疑。這種懷疑不僅產生於教會等級制度本身，還存在於葡萄牙本國及其海外領地，更存在於歐洲各大主權國家內。同時，這

宗教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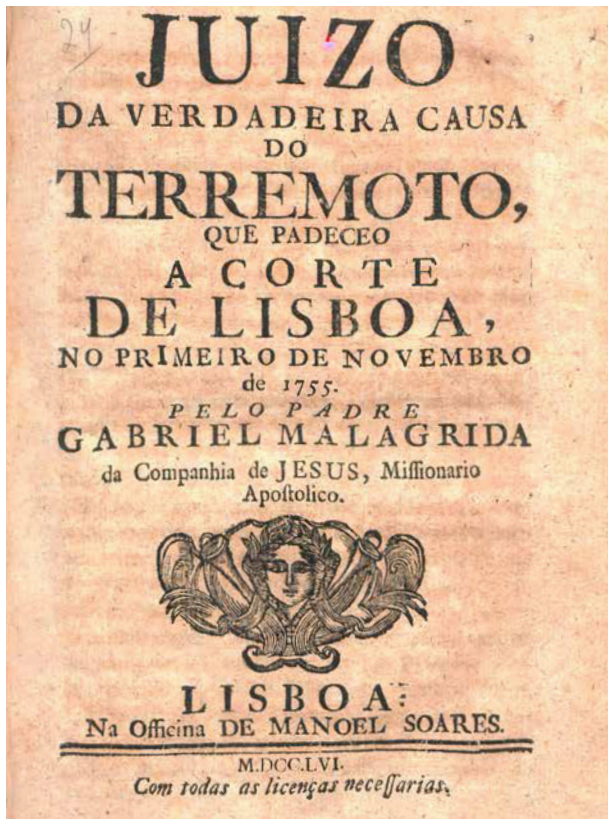


圖5. 加布里埃爾·馬拉格利達神父所作的《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宮廷遭受地震真正原因評判》扉頁（圖片來源：Gabriel Malagrida, *Juizo da Verdadeira Causa do Terremoto que Padeceu a Corte de Lisboa no Primeiro de Novembro de 1755*, Lisboa: Officina de Manoel Soares, 1756.）

種輿論宣傳亦為1759年葡萄牙驅逐耶穌會士及1773年教皇普遍消滅耶穌會士埋下了伏筆。

二、衝突的升級： 十八世紀五十年代的經濟危機及里斯本大地震

十八世紀中期，葡萄牙殖民地的經濟遭受了不可逆轉的損失，糖料出口逐步下滑，黃金開採殆盡，間接影響了關稅及其他貿易的稅收，最終導致國庫空虛；再加上葡萄牙高層腐敗層出，不斷偽造煙草的銷售額，以從國庫中套取自身的收益。“1747年7月6日的法令加強了稅務改革的力度，其中規定了懲罰和防止腐敗的措施。然而，由於在葡萄牙領土上的走私者和海盜的存在，問題仍然存在。”²⁷

從教會的情況來看，該時期葡萄牙宗教人士的人數不斷擴大，則意味着教產的繼續上升。

“就神職人員而言，它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嚴重問題。1735年前，（葡萄牙）總共有510家修道院，其中男修道院佔380家，女修道院佔130家。這些修道院是許多次等貴族子女的職業或避難所，特別是沒有婚約的婦女。然而，它的成員越來越接近世俗世界，已經忘記了一些紀律和宗教奉獻。”²⁸另有統計資料顯示，“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葡萄牙）宗教團體的數量增長了61.6%。1763年，葡萄牙已有538座家道院。”這一趨勢使得葡萄牙重要城市的市中心建築均被宗教人士佔據。誠然，這一宗教熱情也影響了耶穌會在葡萄牙的發展。據統計，“葡萄牙的耶穌會成員從十八世紀初的716人增加到1749年的855人，增長了19.4%。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奧爾登的說法，在這一時期，耶穌會士已成為葡萄牙和海外的第三大宗教修會，僅次於方濟各會和多明尼加會。”²⁹而根據歷史學家麥克斯韋（Kenneth Maxwell）的說法，1750年，葡萄牙有300萬人，神職人員大約有20萬。³⁰宗教人士幾乎成為十八世紀上半葉葡萄牙最富裕的人，而一般的貧苦大眾只能默默地忍受盛世繁華下的日益貧困。

面對此情況，龐巴爾的前任堂·路易士·達·庫亞（D. Luís da Cunha, 1662-1749）曾經在其作品《政治遺囑》（*Testamento Político*）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葡萄牙三分之二的土地為教會所佔有，（而）他們對於國家的支出及安全沒有貢獻。我的意思是說……這些都是危險，是葡萄牙所承受的危機。”³¹堂·路易士·達·庫亞的言外之意是，在國家危難之際，可以將教會的財富作為過渡之用。而此前雖然有法律強調教會對於國家的義務，但均遭到教會的抵制，葡萄牙歷任君主一直採取隱忍的態度，以換取教皇對於葡萄牙王室的承認。但隨着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的推進，葡萄牙國內的教會勢力大不如前，因此，此時正是葡萄牙改革、沒收教會財產的絕佳時刻。

在堂·路易士·達·庫亞反教會思想的指導下，龐巴爾侯爵確立了自己從政以來的宗教政策的指導目標：國家需要從教會解放出葡萄牙工業化所需要的勞動力，用龐大的教產以彌補葡萄牙財政的虧空，尤其是耶穌會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範圍內的財產成為解決困境的關鍵。同時，對於龐巴爾個人而言，“為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卡瓦略（即龐巴爾）很難避免與神職人員的衝突。”³²

但是，里斯本大地震前，龐巴爾對於耶穌會的抱怨並沒有表現得特別明顯。从堂·若澤一世政府給予格勞—帕拉總督富爾塔多·門東薩（Furtado Mendonça, 1701-1769）的新指示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對於耶穌會的實力是認可的：“不要表現出敵意，相反，（耶穌會）在亞馬遜建立新的傳教團，（同時）管理邊境附近的傳教團。”³³ 這種態度一直持續至1755年里斯本地震的發生。

大地震成為驅逐耶穌會事件的轉捩點，典型事件便是對於意大利耶穌會士加布里埃爾·馬拉格里達（Gabriel Malagrida, 1689-1761）神父的處理。馬拉格里達在巴西傳教三十餘載，在葡屬巴西耶穌會社群內享有盛譽。1750年，在巴西礦產衰落之時，該神父前往里斯本，為格勞—帕拉州的修道院籌措資金。在里斯本，馬拉格里達受到葡萄牙王室的禮遇，且成為堂·若昂五世（D. João V, 1689-1750）及其王后的懺悔神父，擁有自由進出宮廷的特權。1751年，在得到堂·若昂五世豐厚資助的情況下，馬拉格里達回到巴西，繼續從事教會的擴建工作。但是，耶穌會在巴西的土地佔有引起了龐巴爾派的不滿。1754年，馬拉格里達的支持者瑪麗亞·安娜（Maria Ana）王后去世，耶穌會與葡萄牙王室的密切聯繫被切斷，幾乎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且馬拉格里達在龐巴爾侯爵面前批評葡屬巴西格勞—帕拉州長的行為引起了侯爵的不滿。

所有的不滿最終在里斯本地震後爆發出來。1755年里斯本地震發生後，為了安撫人

心，龐巴爾將該事件歸結為自然事件。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些實用問題上，這是他那句著名的名言所體現出來的。他說：“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首先必須埋葬死者，照顧生者，而不是為死者的靈魂祈禱。”他以開發“王國中最強大、最有能力的人的才能和資源”，努力恢復秩序。³⁴ 但是，馬拉格里達卻將地震歸結為天命，認為這是上帝對於龐巴爾侯爵削弱宗教秩序的懲罰，並寫作名為“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宮廷遭受地震真正原因評判”³⁵的小冊子，從宗教的角度完整闡釋里斯本大地震發生的重要原因。

“這麼多房屋和宮殿的摧毀者，這麼多教堂和修道院的破壞者，這麼多居民的謀殺者，這麼多寶物的吞噬者……不是彗星，不是星辰，不是蒸汽或其他氣體（Exalações），不是怪事（Fenómenos），不是偶然事件或自然原因，而只能是我們無法忍受的罪。”³⁶ “誰能說這種巨大的鞭打純粹是自然原因的結果，而不是上帝對我們的罪惡所給予的特別懲罰呢？”³⁷ 在此，馬拉格里達解釋里斯本大地震發生的真正原因其實是人類的原罪。他主張在從事任何世俗工作之前都要進行祈禱和精神義務（Deveres Espirituais），迫使罪人皈依和懺悔，以平息神的憤怒。³⁸ 而為了達到宗教上的宣傳效果，馬拉格里達還在人群中進行多次佈道。“一方面，龐巴爾被指責採取了務實甚至無神論的立場，因為他阻止教會在地震後埋葬死者，而且無視教會認為合適的喪葬儀式。另一方面，龐巴爾被視為勸阻君主給予（耶穌會）援助及允許耶穌會在社會上實行公眾懺悔的人物。”³⁹

然而在龐巴爾看來，神父馬拉格里達只不過是一個假先知、騙子和冒險家，況且龐巴爾也有理由對此進行反駁：“如果這場災難是上帝的懲罰，那麼我們怎麼能證明，在里斯本妓院數量最多的街道上，房屋完好無損呢？”⁴⁰ 並且信徒、神職人員也無法理解，在福爾摩沙街的妓院倖免的時候，⁴¹ 大約70%的教會遺產（51座教堂、54座修道院、6處墓地）都

宗教研究

被摧毀了。⁴² 馬拉格里達的佈道非但解救不了里斯本的困境，反而催生了民眾的恐慌及騷亂，以致國王堂·若澤一世在給其駐羅馬的使臣法蘭西斯科·德·阿爾馬達·依·門東薩（Francisco de Almada e Mendonça）信中透露，他有義務告知教皇本篤十四世（Bento XIV，1740—1758年在位），耶穌會在葡萄牙及巴西所造成的恐慌。⁴³

“馬拉格里達的大膽最終將是致命的，這進一步加強了龐巴爾侯爵日益增長的信念，即耶穌會士是一種嚴重的威脅，是一種破壞他政治意識形態的力量。這種意識形態不僅需要保持沉默，還需要消除。”⁴⁴ 在該信念的推動下，龐巴爾侯爵嚴令禁止耶穌會再進行如此煽動、擾亂民眾心理的行為，並讓宗教裁判所將馬拉格里達收押，然後再將其流放至塞圖巴爾（Setúbal）以反省自身的過錯。但是，馬拉格里達並沒有順從龐巴爾的意願，他同往常一樣，接觸了許多貴族，並明確了其反對政府將耶穌會驅逐出里斯本的態度。1761年，馬拉格里達因為在背後煽動對堂·若澤一世的暗殺，最終被宗教裁判所以異端罪判處絞刑。

另外，龐巴爾侯爵與耶穌會的實質衝突，也與由里斯本大地震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有關。“金融危機的根源主要與殖民地收入的減少（特別是黃金和煙草）、外部威脅（最明顯的是七年戰爭）和1755年的地震有關。”⁴⁵ 其中，里斯本大地震的發生是金融危機發生的致命因素。據估計，“不僅三分之二的城市變得無法居住，而且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大建築都被摧毀了：40座大教堂中的87%，75座女修道院（Convents）與男修道院（Monasteries）中的86%……此外33座宮殿、軍械庫、派特里亞夏宮（Patriarchal Palace）及皇家圖書館幾乎被摧毀殆盡。”⁴⁶ 地震後的一段時間，物價飛漲，尤其是小麥、建築原材料及建築工人的價格，漲幅幾乎在50%以上。而根據歷史學家若澤·路易士·卡多佐（José Luís Cardoso）的估計，這種物質和金融資產的巨大損失達到了10萬到15萬埃斯庫

多（Escudo），即葡萄牙國內生產總值的75%。⁴⁷ 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城市混亂的局面。總體上來說，地震在經濟上、政治上和道德上都顛覆了這個國家。大地震後的重建工作，直接損耗了國庫及葡屬巴西的黃金及鑽石，堂·若昂五世時期的財富及建設毀於一旦。

在這樣的情況下，龐巴爾對於葡萄牙國內的經濟採用了保護主義政策，先後建立了幾家貿易壟斷公司，比較有名的有：1755年建立的格勞—帕拉與馬拉尼昂貿易公司、1756年建立的奧托·杜羅葡萄酒農業總公司及1759年的伯南布哥與帕拉伊巴公司。⁴⁸ 然而，這些公司的建立侵犯了耶穌會在葡萄牙及巴西格勞—帕拉與馬拉尼昂州的利益。

格勞—帕拉與馬拉尼昂貿易公司使得耶穌會無法再壟斷亞馬遜地區的出口及海外貿易，耶穌會學院及其在該地區的傳教活動無法得到充分的資金支援，於是耶穌會與格勞—帕拉州總督富爾塔多·門東薩的衝突不斷的升級。在衝突下，總督不斷狀告耶穌會“擁有不可控制的力量，尤其是在海外，他們成立了國中之國。”⁴⁹ 為了維護耶穌會的實質權利，耶穌會採取了雙管齊下的策略。首先通過其與葡萄牙高層的關係，極力勸服國王撤銷貿易公司，同時表達了耶穌會對龐巴爾擔任國務秘書的不滿，建議國王考慮替換國務秘書。其次是在勸說無果後，開始在葡萄牙民眾中佈道，散播關於龐巴爾侯爵的謠言。為了防範類似事件的發生，葡萄牙當局發文禁止耶穌會士對於貿易公司的詆毀。

但耶穌會並沒有因禁令而收斂自身的行為，1757年，耶穌會在葡萄牙的著名港市波爾圖煽動了波爾圖起義。早在1755年，為了挽救波爾圖的葡萄酒市場，以耶穌會神父若昂·德·曼西亞（João de Mansilha）為首的宗教人士及波爾圖葡萄酒商人提議政府建立奧托·杜羅葡萄酒農業總公司。該公司以格勞—帕拉與馬拉尼昂貿易公司為範本，壟斷了波爾圖的葡萄酒，並將其推銷至巴西。但是，此後“因意識到他



圖 6. 加布里埃爾·馬拉格里達神父像（圖片來源：Gabriel Malagrida/Public domain/Wikimedia Commons）

宗教研究

們的主要利益都掌握在國家手中，當地貴族對龐巴爾持懷疑態度。與此同時，當地的貿易商、倉儲商、消費者和煙草商（Tabernistas）也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受到了影響。”⁵⁰

在生活日益貧困的逼迫下，波爾圖的流浪漢、士兵、婦女及兒童都參與了暴動，這使得奧托·杜羅葡萄酒農業總公司成為唯一一家遭受民眾及英國商人嚴重抗議的龐巴爾公司。為了平息事態、安撫民心，龐巴爾侯爵下令逮捕了民眾，並對他們進行審判：“26人被判處死刑，其中16人被執行死刑，8名逃犯和1名即將分娩的婦女遭受鞭笞，184名民眾被處以放逐、監禁、罰沒及罰款。16名男孩被判處掌罰。”⁵¹此事過後不久，龐巴爾對於耶穌會神父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進行了清算，將耶穌會神父定為叛亂的煽動者。他們說，公司的葡萄酒沒有作為彌撒祭品的資格。他們煽動了民眾的惡意，在起義結束後，他們呼籲“只有婦女和信徒才能參與重大事件，並要求鎮壓不公正及貪慾。”⁵²為了平息事態，1757年11月21日，王室開始採取措施，禁止耶穌會會士再踏進葡萄牙宮廷。

同時，波爾圖起義加重了葡萄牙國內反耶穌會的氛圍，從而使得龐巴爾侯爵有正當的理由向教皇施壓以要求教皇同意驅逐其境內的耶穌會士。1758年3月9日，葡萄牙駐羅馬大使法蘭西斯科·德·阿爾馬達·依·門東薩在與教皇本篤十四世的會晤中表明了葡萄牙的態度，希望教皇在徹底消滅或是徹底改革葡萄牙及其海外領地的耶穌會間做出明智的抉擇。⁵³1758年4月1日，教皇本篤十四世不得不針對近期事件發佈了教皇諭令，隨後派遣葡萄牙籍紅衣主教法蘭西斯科·薩爾達尼亞（Francisco Saldanha）前往葡萄牙，調查葡萄牙耶穌會的真實狀況。但是直到1758年6月6日，克萊門特十三世（Clemente XIII，1758—1769年在位）當選為新一任教皇時，羅馬教廷方面還未曾對於該事件做出實質性的解釋，這引發了葡萄牙國內龐巴爾派的強烈不滿，反耶穌會的決心也越來越堅定。

總體上來說，1755年的地震是葡萄牙發生的對歐洲影響最直接、最廣泛的事件。這一事件的災難性後果激起了人們對重大災難的正常情緒，但也在科學、宗教和哲學層面上產生了持久的影響。⁵⁴對於龐巴爾個人來說，里斯本大地震是其政治生涯中的決定性時刻。地震給予其施展組織和領導能力的重要契機，從而為其在以後的政治改革中積累了人脈及威望。假如沒有這些威望，“他將不可能迫害耶穌會，也不可能減少教會（對政治）的影響”，⁵⁵更不可能有機會開始以他為標誌的葡萄牙開明專制時代。

另外，里斯本大地震與該時期的其他事件一起，使得十八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葡萄牙王室與耶穌會的矛盾越來越深刻。“1755年的年里斯本地震，1756年反對瓜拉尼人的運動，1757年戰爭主要費用的支付，重建城市的費用等被累積起來。此外，還設想了一項補充限額的條約，這是一項新的開支，龐巴爾侯爵想要用錢來維持他的工業冒險。”⁵⁶然而，耶穌會的富有與地震後葡萄牙的貧病交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數據稱，驅逐行動開始的時候，在葡屬巴西的耶穌會人數大約為600人，其治下的追隨者在150萬至200萬人之間，由此推測，耶穌會以絕少數人口，控制着國家的大部分財產，成為葡屬巴西最大的私有業主。⁵⁷在這樣的狀況下，龐巴爾侯爵在1757年提交給教皇的請願書及1759年的《皇家憲章》中，均表達了沒收耶穌會財產的願望。可以說，里斯本大地震是自《邊界條約》以來，龐巴爾驅逐耶穌會的第二个先導因素。

三、衝突的爆發：堂·若澤一世被刺案與耶穌會負面形象的最終形成

如果說里斯本大地震加深了龐巴爾驅逐耶穌會的信念，那麼1758年就是龐巴爾實施驅逐耶穌會計劃的重要一年。該年8月27日，堂·若澤一世的姐姐西班牙王后瑪麗亞·芭芭拉（Maria Bárbara，1711—1758）去世，耶穌會失去了其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強大庇佑。



圖 7. 堂·若澤一世像 (圖片來源: Portrait of Joseph Emanuel, King of Portugal/Public domain/Wikimedia Commons)

宗教研究

同年9月3日，國王堂·若澤一世遭到刺殺。該事件的細節是：該日，國王掙脫王后的監視，趁着夜色，在其寵臣佩德羅·特謝拉（Pedro Teixeira）的陪同下，前往其情婦的住所，而在返回王宮途經的貝倫（Belém）高地處遭遇到了襲擊。在打鬥的過程中，國王的手臂及臀部均遭到了槍傷。為了掩蓋國王遭遇到襲擊的事實，葡萄牙宮廷對外宣稱，國王只是生病了；對內則加緊了對於刺殺真兇的搜查。12月9日，龐巴爾對外詳細公佈了堂·若澤一世遇刺的細節，並懸賞追查真兇。

很快，葡萄牙官方鎖定了兇手。“12月13日，塔沃拉侯爵（Marquis of Tavora）、他的兩個兒子、四個弟兄、女婿阿托吉亞伯爵（Count d'Atouguia）和阿隆那侯爵（Marquis d'Alorna），連同堂·馬諾埃爾·德·索薩·卡利亞里茲（Dom Manoel de Souza Calhariz）及他們的僕人均被收押至貝倫監獄，塔沃拉侯爵夫人被送往修道院，其他塔沃拉家族成員似乎被監禁或禁閉於修道院。”⁵⁸ 與此同時，耶穌會神父也遭到了幽禁，刺殺案的另外一位主謀——阿威羅公爵（Duke of Aveiro）雖然初時躲過了逮捕，但是最終還是被送入獄。

“12月28日，法庭對於犯罪嫌疑人阿威羅公爵進行了訊問，法庭想從他那裡得到甚麼？顯然是對耶穌會的譴責。……28日，被告終於承認，犯罪的想法來自瑞士以外的國家……四名耶穌會神父……同意只殺死國王，更重要的是，他們告訴公爵，弑君不是一種罪過，一切都將得到補償，但阿威羅公爵並沒有就此止步，他開始指責所有人，塔沃拉侯爵、阿托吉亞伯爵、里貝拉伯爵等等。”⁵⁹ 在阿威羅公爵的描述中有很多自相矛盾之處，但龐巴爾有意將這些信息聚集在一起，從而使阿威羅公爵、塔沃拉侯爵和耶穌會成為這次刺殺案件的罪魁禍首。⁶⁰

可以肯定的是，阿威羅公爵和塔沃拉侯爵參與了刺殺國王的案件，理由是：堂·若澤一世與塔沃拉侯爵夫人堂·阿拉麗亞·特蕾薩（D.

Alaria Theresa）是情人關係，遇刺前國王曾經與她在一起，這使得塔沃拉侯爵因愛生恨，由此產生了刺殺的意圖。另外，官員也在阿威羅公爵的家中搜到了秘信：“我贊成你的計劃，在目前的情況下，別無選擇。要摧毀塞巴斯蒂安·若澤·德·卡瓦略·依·梅洛的權威，我們必須消滅國王約瑟夫（José I）的權威。”⁶¹ 但是，耶穌會是否為此次事件的幕後導師，則疑點重重。

根據阿威羅公爵的證詞以及馬拉格里達神父作為塔沃拉夫人懺悔神父的身份，龐巴爾斷定，這次暗殺企圖包含了強大的塔沃拉家族高級貴族成員與耶穌會士的勾結。⁶² 另外，耶穌會謀殺君主的傳統屢見不鮮，例如耶穌會對於法國國王亨利克四世（Henrique IV, 1553-1610）的刺殺。耶穌會參與此次行動的證據似乎確鑿無疑，但是也有學者提出，或許耶穌會並未參與對堂·若澤國王的刺殺行動，但是這件事卻成為龐巴爾侯爵將耶穌會塑造成暗殺者的有力證據。⁶³ 同時，從當時外國使者的信件中也可以從側面證明，刺殺案發生的“三個星期之後，另一位法國駐葡萄牙朝廷的外交代表莫爾伯爵（Conde de Merle）在給舒瓦瑟爾公爵（Duque de Choiseul）的信中，宣稱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表明，耶穌會士是刺殺葡萄牙國王的真正策劃者。”⁶⁴ 然而，儘管如此，1759年1月19日，龐巴爾在輿論的推動下，以弑君者的罪行下令沒收耶穌會在葡萄牙的全部財產。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大多數史學家均贊同堂·若澤一世遇刺案是龐巴爾驅逐耶穌會的藉口的觀點。1943年，佩德羅在其作品中認為：“國王遇刺事件，幫助龐巴爾侯爵剷除了自己的政治天敵，同時讓他把憤怒發洩在耶穌會士身上，並利用這個機會把耶穌會士趕出這個國家。”⁶⁵ 另有學者從政教關係的角度認為，對於塔沃拉的審判，超越了事件本身。事實上，這是“一項更大的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在面對教會的世俗權力和像塔沃拉這樣的貴族的特權時，肯定王室的權威。”⁶⁶ 弗朗克認為，這

件事被用來“充分譴責耶穌會士，並證明龐巴爾政府所希望的激進措施是合理的。”⁶⁷ 對弑君者塔沃拉的判決“顯然不是針對貴族血統的弑君者，而是針對他們所謂的導師。這一實為反耶穌會的判決使龐巴爾長期渴望的消滅耶穌會的最後過程合法化。”⁶⁸ 不僅如此，弗朗克還認為，堂·若澤國王的遇刺案被龐巴爾加以宣揚，使得“聖依納爵的修道會變成了一個結構墮落、叛逆、反常的機構，不值得天主教王國和教會本身的信任。由此，耶穌會不僅被視為一個潛在的，而且被視為公共和平的真正敵人和王國最高領導人的叛徒。”⁶⁹

總體上來看，龐巴爾派的行政原始目標是使得葡萄牙再次歐洲化，再次步入歐洲的大國行列。塔沃拉公爵的被處決及耶穌會的被驅逐，只是實現歐洲化的重要步驟。由此，以犧牲教會為代價，龐巴爾侯爵擴大了皇家對葡萄牙經濟、政治及文化上的管理範圍。耶穌會是龐巴爾侯爵在履行其政府職責時所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⁷⁰ 最合理的辦法不是要消滅天主教貴族，而是要他們服從國家的領導。龐巴爾想要採取新教政策，是試圖消除稅收和政治特權，降低教會機構的成本或其對葡萄牙財政的影響，並重申世俗法律的優勢。⁷¹

在驅逐目標明確的情況下，龐巴爾開始有預謀地通過輿論的方式，發行關於耶穌會罪惡事跡的小冊子，以期在民眾中間塑造耶穌會的負面形象。其中，國際出版物《秘密檢查》(*As Monita Secreta*) 成為龐巴爾實施輿論戰的先期作品。這本書為龐巴爾派學者寫作耶穌會題材的作品提供了範例。該書於1614年首次在波蘭編輯出版，隨後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及其他語種，流佈至歐洲各大國。“大約在十七世紀末，《秘密檢查》的文本開始被重新設計。在創建標題和副標題的同時，還添加了第十七章。然後，文本的最後一段被放置於作品的開端處，作為序言。隨後的版本在語言上改進了《秘密檢查》，以增強其可讀性。正是以這種完美的形式，使得他們在十八世紀傳播開來。”⁷² 《秘密檢查》是該時代最受讀者

喜愛的暢銷書，幾乎成為反耶穌會最厲害的宣傳武器。

儘管到了1759年耶穌會被驅逐，葡萄牙境內還未曾有葡萄牙語版的《秘密檢查》，但是，這並不妨礙葡萄牙民眾反耶穌會的心理預知，也不妨礙葡萄牙高層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國際社會所提供的關於反耶穌會的意見、資料、案例及期刊，為龐巴爾的反耶穌會計劃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論支撐。龐巴爾隨後出版的反耶穌會的宣傳冊子，明顯受到諸如《秘密檢查》之類的作品的影響。

歸結起來，按照攻擊的目標範圍，龐巴爾反耶穌會的宣傳作品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針對葡萄牙最大的殖民地葡屬巴西境內的耶穌會，一類是針對葡萄牙帝國境內的所有耶穌會士。第一類作品有如《邊界條約》所引發的作品，⁷³ 其創作動機是證明耶穌會權力對於維護葡萄牙及西班牙邊界利益的強大阻礙。為了支撐該觀點，作品將亞馬遜委員會及軍事首領的信件及葡西兩國的官方通信作為原始材料，對耶穌會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具體的抨擊，認為耶穌會在亞馬遜地區建立了違抗葡萄牙君主權力的國中之國，且控制了將近31個印第安村莊內的印第安人的勞動、生活及自由，破壞了國家將印第安人納入公共村莊的管理計劃。

為了達到宣傳的效果，龐巴爾決意在1757年12月3日，即葡萄牙的重要節日方濟各·沙勿略(São Francisco Xavier)節，在首都里斯本散佈《簡要報告》。出人意料的是，這本由無名氏所作的非官方冊子，一經發售，發行量竟然突破了兩萬冊。且為了引起國際社會尤其是羅馬的注意，龐巴爾命令將該冊子翻譯成法文、意大利文，甚至是漢語，將反耶穌會的思想傳達至歐洲各個宮廷及貴族手中。簡而言之，龐巴爾希望耶穌會所在之地均有反耶穌會的活動及計劃。“《簡要報告》開創了一種風格，一種修辭的手段，一種判斷的嚴肅性，一種謾罵的激烈程度，以及一種影響範圍的維度，這些都是反耶穌會的龐巴爾文學的顯著特

宗教研究

徵。它嚴厲地激化了之前葡萄牙傳統的反耶穌會話語，目的是完全妖魔化聖依納爵·羅耀拉的隨從（即耶穌會士）。”⁷⁴

另外一部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在堂·若澤國王遇刺及塔沃拉侯爵被行刑後的判決書。1759年，在龐巴爾的授權下，米格爾·羅德里格斯（Miguel Rodrigues）在里斯本出版了大約32頁的小文章《耶穌會的宗教人士誤導那些被判有罪的被告，並打算在這些國家的人民中傳播邪惡和煽動性的錯誤》⁷⁵。該書認為耶穌會是此次謀殺案的煽動及策劃者，犯有不可描述的弑君罪。書中列舉了耶穌會所犯的四種錯誤，即誹謗、謀殺、不虔誠及非法牟利。因此，國家應該不遺餘力地清剿隱藏在人民中間的反動分子。仔細閱讀該文，我們會發現其中心思想與《秘密檢查》較為一致，認為在耶穌會的虛偽宗教外表下，還蘊藏着有組織、有領導的罪惡的且不為人知的秘密。而與《簡要報告》相比較，該書將對耶穌會的指責與謾罵更加明確化、公開化，且可讀性更強。

儘管前兩部作品的批評力度已經很強，但是還不夠綜合。於是在龐巴爾的倡議下，葡萄牙反耶穌會的巨著《分析及歷史演繹》⁷⁶得以面世。該書於1767年出版了前兩卷，1768年出版了第三卷及再版了第五卷。該作品先特意將葡萄牙耶穌會的重要人物——國王的懺悔神父斯茂·羅德里格斯（Simão Rodrigues, 1510-1579）、巴西傳教的實權人物安東尼奧·維艾拉及加布里埃爾·馬拉格里達作為批駁的靶子，列舉耶穌會犯的種種錯誤。再將耶穌會與葡萄牙的落後聯繫起來，認為自葡萄牙建立以來，一直果敢、堅毅地建立了繁榮昌盛的海洋帝國。該帝國連同世界四大洲、五大洋，開啟了葡萄牙的黃金時代。但這一切隨着耶穌會落戶葡萄牙而終結，他們開啟了葡萄牙蒙昧無知的黑暗時代。為了再次恢復榮光，國王堂·若澤一世決定整頓朝綱，將帝國的害群之馬驅逐出境，以恢復葡萄牙帝國的國際地位及經濟實力。接着在第二部分，該書分析了教權與王權間的關係，認為王國的審查及檢查權一直是

世俗的特有權力，宗教人士只有在王權特別應允的情況下，才能行使該權力，否則便是謀逆。

總體上來說，該書對於葡萄牙近兩百年來的政治歷史進行了比較好的解讀，同時解釋了君主權力來源於上帝而不是神父。而與前述的兩部作品相比，該書是建構耶穌會不齒形象的決定性作品，其推理及分析非其他作品所及，因此傳播廣泛，曾經像《秘密檢查》一樣被翻譯為多種語言，在法國、德國、葡萄牙的鄰國西班牙及意大利流傳。

在這一系列的輿論攻勢下，龐巴爾終於在驅逐耶穌會行動開始前或在行動中，將一直存在於葡萄牙的反耶穌會主義激發出來，使得反耶穌會主義深入每個民眾的內心，同時也遍及葡萄牙及其海外領地的各個角落。“在這個大都市，反耶穌會主義表現在關於耶穌會士的權力、財富和教育擴張主義的衝突、辯論和爭論中。在東方和非洲，反耶穌會主義尤其在關於耶穌會商業實踐的傳教方法的爭議以及關於傳教領土和影響力的爭議中發展起來。在巴西，反耶穌會主義在與定居者的無數衝突中獲得了重要的可見性。”⁷⁷

龐巴爾侯爵並不是葡萄牙反耶穌會主義的原始發動者，也不是終結者。與葡萄牙或者葡屬巴西的眾多的耶穌會反對者相比，他的不同之處在於，將過往碎片化或間接化的反耶穌會行動及宣傳重新整合，賦予其新的名稱、動機、形式，以整合成一套完整且邏輯嚴密的反耶穌會宣傳理論，其撰寫、監督、贊助發行的小冊子、報紙、雜誌、法律、畫作等等，使得關於耶穌會的懷疑、指責、謠言由口頭轉換為書面表達，使得耶穌會形象妖魔化、罪惡化、腐敗化，從而激起了葡萄牙民眾對於耶穌會的憎惡。至此，耶穌會的負面形象最終塑造完成，驅逐耶穌會的行動也水到渠成。1759年9月1日，葡萄牙方面基本認定耶穌會在國王遇刺案中所犯的罪行，在此事發生後的1759年9月3日，堂·若澤一世頒佈了一項法令，禁止、取締和驅逐耶穌會的宗教團體，禁止在王國內與他們

進行任何口頭或者書面的交流。⁷⁸ 1773年，龐巴爾迫使教皇克萊門特十四世頒佈名為“吾主救世主”（Dominus ac Redemptor）的終結全歐耶穌會的行動，至此，龐巴爾的反耶穌會道路宣佈結束。

四、結語

總體上來看，十八世紀下半葉，葡萄牙在內部和外部力量的推動下經歷了深刻的變革。耶穌會的被驅逐行動是葡萄牙國家歷史的轉捩點，同時也是十八世紀下半葉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內部事件的結果。1750年的《邊界條約》拉開了龐巴爾驅逐耶穌會的序幕，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引起的經濟危機和社會混亂，加劇了葡萄牙國內與耶穌會間的矛盾，而1758年的國王遇刺案則最終刺激了龐巴爾驅逐耶穌會的動機，使得他通過宣傳成功地鞏固了民眾的反耶穌會信念。驅逐耶穌會事件緣起於葡萄牙國內外的矛盾，而在這事件中始終穿插着永恆不變的驅逐信念：葡萄牙和殖民地的落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教會的強大統治，特別是耶穌會士；他們負責鞏固一個不可改變的秩序。⁷⁹ 驅逐行動的目的是維護盧西塔尼亞國家的王室權威和主權，並促進受到宗教威脅的社會的和諧。決策者所堅持的論點是，教會特別是耶穌會，不接受葡萄牙的統治。⁸⁰ 驅逐不僅在政治上維護了國家的利益，也維護了信徒的安寧，而由此事件的結果將導致葡萄牙全方位的變革。

附：本文係龍秀清負責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西方政教關係核心文獻整理、翻譯與研究”（項目批准號：18ZDA216）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1. 原名塞巴斯蒂昂·若澤·德·卡瓦略·埃·梅洛（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o），1699年5月13日出生於葡萄牙的小貴族家庭，1782年逝世。他曾擔任皇家歷史委員會委員，負責葡萄牙歷史的編纂；1738至1749年，擔任葡萄牙駐英大使，其中1745年至1749年兼任葡萄牙在維也納的外交官。其外交工作的經歷對其日後的政治工作，至關重要。1750年，受國王若澤一世的委任，龐巴爾出任國家第一總理大臣（Primeiro-ministro），由此，葡萄牙開始了龐巴爾執政時期（1750—1777年），同時也是龐巴爾改革時期。
2. Serafim Leite, *História da Companhia de Jesus no Brasil*, Rio de Janeir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38–1950.
3. Pedro Calmon, *História do Brasil*, Tomo III: Organização (1700–1800), São Paulo: Companhia Editora Nacional, 1943, p. 224.
4. Jorge Borges de Macedo,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no Tempo de Pombal: Alguns Aspectos*, Porto, 1952.
5. Stefan Gatzhammer, "Antijesuítismo Europeu: Relações Político-diplomáticas e Culturais entre a Baviera e Portugal (1750–1780)", *Lusitania Sacra*, Lisboa, 2ª Série, Tomo V, 1993, p. 175.
6. Dauril Alden, "Aspectos Econômicos da Expulsão dos Jesuítas do Brasil", in H.H. Keith & S.F. Edwards, *Conflito e Continuidade na Sociedade Brasileira*, São Paulo: Civilização Brasileira, 1970.
7. Manuel Antunes, "O Marquês de Pombal e os Jesuítas", in Manuel Antunes (org.), *Como Interpretar Pombal? No Bicentenário da sua Morte*, Lisboa: Edições Brotéria, 1983.
8. 轉引自 João Francisco Silva Sousa Pereira, "Um Político Católico no Tempo das Luzes: A Religião em 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o", *Dissertação de Mestrado*, Universidade Católica Portuguesa, 2019, p. 78.
9. José Eduardo Franco, "O 'Terramoto' Pombalino e a Campanha de 'Desjeuitizaço' de Portugal", *Lusitania Sacra*, 2ª Série, Tomo XVIII (2006), p. 181.
10. 即法蘭西斯科·沙維爾·德·門東薩·富爾塔多（Francisco Xavier de Mendonça Furtado, 1700–1769），為龐巴爾侯爵的弟弟，1751至1759年擔任格勞—帕拉及馬蘭豪的州長，1760至1769年擔任海軍及海外事務國務秘書。
11. Edgard Leite, *"Notórios rebeldes" A expulsão da Companhia de Jesus da América Portuguesa*, Madrid: Fundación Mapfre Tavera, 2000, p. 138.
12. José Eduardo Franco, "Fundação Pombalina do Mito da Companhia de Jesus", *Revista de História das Ideias*, Vol. 22 (2001), p. 241.
13. Fabricio Lyrio Santos, "A Expulsão dos Jesuítas da Bahia:

宗教研究

- Aspectos Econômicos", *Revista Brasileira de História*, Vol. 28, n.º 55 (2008), p. 175.
14. João Lúcio Azevedo, *Os Jesuítas no Grão-Pará—suas Missões e a Colonização*, Coimbra: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1930, p. 197.
 15. João Lúcio Azevedo, *Os Jesuítas no Grão-Pará—suas Missões e a Colonização*, Coimbra: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1930, p. 177.
 16. Visconde de Carnaxide, *O Brasilna Administração Pombalina*, São Paulo: Companhia Editor Nacional, 1941, p. 145.
 17. "Instruções Régias, Públicas e Secretas para Francisco Xavier de Mendonça Furtado, Capitão-General do Estado de Grão-Pará e Maranhão", Lisboa, 31 de maio de 1751.
 18. 轉引自 Roberto Barros Dias, "História da Expulsão dos Jesuítas da Capitania de Pernambuco e anexas (Ceará, Paraíba e Rio Grande do Norte) em 1759: a Disputa política e os Domínios da Educação", Tese de doutoramento,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Ceará, 2017, p. 63.
 19. João Lúcio de Azevedo, *O marquês de Pombal e a sua Época*, Rio de Janeiro: Anuario do Brasil Seara Nova, 1922, p. 140.
 20. Visconde de Carnaxide, *O Brasil na Administração Pombalina*, São Paulo: Companhia Editora Nacional, 1941, p. 31.
 21. Visconde de Carnaxide, *O Brasil na Administração Pombalina*, São Paulo: Companhia Editora Nacional, 1941, p. 155.
 22. "Relação Abreviada da Republica que os Religiosos Jesuítas das Provindas de Portugal e Hespanha Estabelecerão nos Domínios Ultramarinos das duas Monarchias, e da Guerra que nelles Temmovido, e Sustentado contra os Exercitos Hespanhoes, e Portugueses; Formado pelos Registos das Secretarias dos dous Respectivos Principes Commissarios, e Plenipotenciarios; e por Outros Documentos Authenticos", publicadas com indicação de lugar e data, Lisboa, 1757.
 23. "Relação Abreviada da Republica que os Religiosos Jesuítas das Provindas de Portugal e Hespanha Estabelecerão nos Domínios Ultramarinos das duas Monarchias, e da Guerra que nelles Temmovido, e Sustentado contra os Exercitos Hespanhoes, e Portugueses; Formado pelos Registos das Secretarias dos dous Respectivos Principes Ccommissarios, e Plenipotenciarios; e por Outros Documentos Authenticos", publicadas com indicação de lugar e data, Lisboa, 1757, p. 37.
 24. "Relação Abreviada da Republica que os Religiosos Jesuítas das Provindas de Portugal e Hespanha Estabelecerão nos Domínios Ultramarinos das duas Monarchias, e da Guerra que nelles Temmovido, e Sustentado contra os Exercitos Hespanhoes, e Portugueses; Formado pelos Registos das Secretarias dos dous Respectivos Principes Commissarios, e Plenipotenciarios; e por Outros Documentos Authenticos", publicadas com indicação de lugar e data, Lisboa, 1757, p. 48.
 25. Pedro Calmon, *Historia do Brasil*, Tomo III: A Organização (1700–1800), São Paulo: Companhia Editora Nacional, 1943.
 26. João Lúcio de Azevedo, *O Marquês de Pombal e a sua Época*, 2ª ed., Rio de Janeiro: Anuario do Brasil Seara Nova, 1922, p. 115.
 27. Roberto Barros Dias, "História da Expulsão dos Jesuítas da Capitania de Pernambuco e anexas (Ceará, Paraíba e Rio Grande do Norte) em 1759: a Disputa política e os Domínios da Educação,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Ceará", Tese de doutoramento, 2017, p. 58.
 28. Mary del Priore, *O Mal sobre a Terra: Uma História do Terremoto de Lisboa*, Rio de Janeiro: Topbooks Editora, 2017, p. 75.
 29. 轉引自 Roberto Barros Dias, "História da Expulsão dos Jesuítas da Capitania de Pernambuco e anexas (Ceará, Paraíba e Rio Grande do Norte) em 1759: a Disputa política e os Domínios da Educação",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Ceará, Tese de doutoramento, 2017, p. 53.
 30. 轉引自 Edgard Leite, *A Expulsão da Companhia de Jesus da América Portuguesa*, Madrid: Fundación Mapfre Tavera, 2000, p. 113.
 31. D. Luís da Cunha, "Testamento Político", em Isócrates et al., *Conselhos aos Governantes*, Brasília: Senado Federal, Conselho Editorial, 1998, p. 614.
 32. João Lúcio de Azevedo, *O Marquês de Pombal e a sua Época*, 2ª ed., Rio de Janeiro: Anuario do Brasil Seara Nova, 1922, p. 127.
 33. João Lúcio de Azevedo, *O Marquês de Pombal e a sua Época*, 2ª ed., Rio de Janeiro: Anuario do Brasil Seara Nova, 1922, p. 127.
 34. Fúnia Ferreira Furtado, "Molesky Mark, This Gulf of Fire: the Destruction of Lisbon, or Apocalypse in the Age of Science and Reason", New York: Knopf, 2015, e-JPH, Vol. 15, n.º 2 (December 2017), p. 79.
 35. Gabriel Malagrida, *Juizo da Verdadeira Causa do Terramoto que Padeceu a Corte de Lisboa no Primeiro de Novembro de 1755*, Lisboa: Officina de Manuel Soares, 1756.
 36. Gabriel Malagrida, *Juizo da Verdadeira Causa do Terramoto*

- que Padeceu a Corte de Lisboa no Primeiro de Novembro de 1755, Lisboa: Officina de Manuel Soares, 1756, p. 3.
37. 轉引自 João Lúcio de Azevedo, *O Marquês de Pombal e a sua Época*, 2ª ed., Rio de Janeiro: Anuario do Brasil Seara Nova, 1922, p. 81.
 38. Gisela Maria do Val, Julio Groppa Aquino, "O Grande Terremoto de Lisboa e A Irrupção de Uma Nova Ordem Socio educativa", *Revista História da Educação (Online)*, 2019, Vol. 23. p. 19.
 39. 轉引自 Julio Cesar da Costa Silva, "O Terremoto de Lisboa de 1755 e a Trajetória Política de 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o", Univesidade de Federal do Espírito Santo, Tese de Mestrado, 2016, p. 106.
 40. Evaldo Becker e Michele Becker, "Contribuições de Rousseau ao Entendimento dos Desastres Socioambientais Contemporâneos", *Trans/Form/Ação*, Marília, Vol. 37, n.º 2 (Mai. / Ago., 2014), p. 112.
 41. João Francisco Marques, "A Ação da Igreja no Terramoto de 1755: Ministério Espiritual e Pregação", *Lusitana Sacra*, 2ª Série, Tomo XVIII (2006), p. 220.
 42. José Vicente Serrão, "Os Impactos Económicos do Terramoto", em Vários, *O Terramoto de 1755: Impactos Históricos*, Lisboa: Livros Horizonte, 2007, p. 148.
 43. Stefan Gatzhammer, "Antijesuítismo Europeu: Relações Político-Diplomáticas e Culturais entre a Baviera e Portugal (1750–1780)", *Lusitania Sacra*, Lisboa, 2ª Série, Tomo V (1993), p. 168.
 44. José Eduardo Franco, "O 'Terramoto' Pombalino e a Campanha de 'Desjeuitizão' de Portugal", *Lusitania Sacra*, 2ª Série, Tomo XVIII (2006), p. 157.
 45. Alvaro S. Pereira, "The Opportunity of a Disaster: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1755 Lisbon Earthquak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69 (December 2009), p. 27.
 46. Alvaro S. Pereira, "The Opportunity of a Disaster: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1755 Lisbon Earthquak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69 (December 2009), p. 10.
 47. 轉引自 Roberto Barros Dias, "História da Expulsão dos Jesuítas da Capitania de Pernambuco e anexas (Ceará, Paraíba e Rio Grande do Norte) em 1759: a Disputa política e os Domínios da Educação", Tese de doutoramento,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Ceará, 2017, p. 174.
 48. Companhia Geral do Comércio do Grão-Pará e Maranhão (1755), a Companhia Geral da Agricultura das Vinhas do Alto Douro (1756) e a de Pernambuco e Paraíba (1759).
 49. Henrique Leitão, Francisco Malta Romeiras, "The Role of Science in the History of Portuguese Anti-Jesuitism", *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 no. 2 (2015), p. 80.
 50. Julio Cesar da Costa Silva, "O Terremoto de Lisboa de 1755 e a Trajetória Política de 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o", Tese de Mestrado,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Espírito Santo, 2016, p. 103.
 51. João Lúcio de Azevedo, *O Marquês de Pombal e a sua Época*, 2ª ed., Rio de Janeiro: Anuario do Brasil Seara Nova, 1922, p. 159.
 52. João Lúcio de Azevedo, *O Marquês de Pombal e a sua Época*, 2ª ed., Rio de Janeiro: Anuario do Brasil Seara Nova, 1922, p. 160.
 53. Gatzhammer Stefan, "Antijesuítismo Europeu: Relações Político-Diplomáticas e Culturais entre a Baviera e Portugal (1750–1780)", *Lusitania Sacra*, Lisboa, 2ª Série, Tomo V (1993), p. 171.
 54. Mary del Priore, *O Mal sobre a Terra: Uma História do Terremoto de Lisboa*, Rio de Janeiro: Topbooks Editora, 2017, p. 149.
 55. Alvaro S. Pereira, "The Opportunity of a Disaster: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1755 Lisbon Earthquak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69 (December 2009), p. 23.
 56. Visconde de Carnaxide, *O Brasilna Administração Pombalina*, São Paulo: Companhia Editora Nacional, 1941, p. 161.
 57. Edgard Leite, *A Expulsão da Companhia de Jesus da América Portuguesa*, Madrid: Fundación Mapfre Tavera, 2000, p. 148.
 58. Jonh Smith, *Memoirs of the Marquis of Pombal*,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3, p. 194.
 59. Manuel Rodrigues, "Grandes de Portugal no século XVIII. Inventários da casa de Tavora, Atoguia e Aveiro (1758–1759)", *Pecunia*, Núm. 11 (julio–diciembre 2010), p. 36.
 60. Manuel Rodrigues, "Grandes de Portugal no século XVIII. Inventários da casa de Tavora, Atoguia e Aveiro (1758–1759)", *Pecunia*, Núm. 11 (julio–diciembre 2010), p. 34.
 61. João Lúcio de Azevedo, *O Marquês de Pombal e a sua Época*, 2ª ed., Rio de Janeiro: Anuario do Brasil Seara Nova, 1922, pp. 170–188.
 62. José Eduardo Franco, "O 'Terramoto' Pombalino e a Campanha de 'Desjeuitizão' de Portugal", *Lusitania Sacra*, 2ª Série, Tomo XVIII (2006), p. 175.
 63. *Collecção dos Negócios de Roma no Reinado de El-Rei Dom José I*, Parte I, 1755–1760, Lisboa, 1874, pp. 85–99.
 64. José Eduardo Franco, "O 'Terramoto' Pombalino e a Campanha de 'Desjeuitizão' de Portugal", *Lusitania Sacra*, 2ª Série, Tomo XVIII (2006), p. 196.
 65. Pedro Calmon, *História do Brasil*, Tomo III: Organização

宗教研究

- (1700–1800), São Paulo: Companhia Editora Nacional, 1943, p. 229.
66. 轉引自 Guilherme de Oliveira Santos e Leandro Correia e Roberto Carlos Reis, *O Processo dos Távoras: A Revisão Instauração, Depoimentos e Sentenças*, Lisboa: Caleidoscópio, 2017, p. 37.
67. José Eduardo Franco, "O 'Terramoto' Pombalino e a Campanha de 'Desjeuitizão' de Portugal", *Lusitania Sacra*, 2ª Série, Tomo XVIII (2006), p. 175.
68. José Eduardo Franco, "O 'Terramoto' Pombalino e a Campanha de 'Desjeuitizão' de Portugal", *Lusitania Sacra*, 2ª Série, Tomo XVIII (2006), p. 182.
69. José Eduardo Franco, "O 'Terramoto' Pombalino e a Campanha de 'Desjeuitizão' de Portugal", *Lusitania Sacra*, 2ª Série, Tomo XVIII (2006), p. 184.
70. João Francisco Silva Sousa Pereira, "Um Político Católico no Tempo das Luzes: A religião em 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o", Dissertação de Mestrado, Universidade Católica Portuguesa, 2019, p. 75.
71. Edgard Leite, *A Expulsão da Companhia de Jesus da América Portuguesa*, Madrid: Fundación Mapfre Tavera, 2000, p. 114.
72. José Eduardo Franco e Cristine Vogel, "As Monita Secreta: Historia de um Best-Seller Antijesuítico", *Percursos*, Florianópolis, Vol. 4, n.º 1 (Julho 2003), p. 98.
73. "Relação Abbreviada da Republica que os Religiosos Jesuitas das Provindas de Portugal e Hespanha Estabelecerão nos Domínios Ultramarinos das duas Monarchias, e da Guerra que nelles Temmovido, e Sustentado contra os Exercitos Hespanhoes, e Portugueses; Formado pelos Registos das Secretarias dos d ous Respectivos Principes Commissarios, e Plenipotenciarios; e por Outros Documentos Authenticos", publicadas com indicação de lugar e data, Lisboa, 1757.



74. José Eduardo Franco, "Os Catecismos Antijesuíticos Pombalinos—As Obras Fundadoras do Antijesuitismo do Marquês de Pombal", *Revisita Lusófona de Ciência da Religiões*, Vol. 4, n.º 7–8 (2005), p. 252.
75. Miguel Rodrigues, *Errosímpios e Sediciosos que os Religiosos da Companhia de Jesus Ensinaram aos Réus, que for Amjustiçados, e Pretenderam Espalhar nos Povos destes Reinos*, Lisboa: Officina de Miguel Rodrigues, Impressor do Eminentíssimo Senhor Cardeal Patriarca, 1759.
76. José de Seabra da Sylva, *Dedução Chronologica, e Analytica na qual se Manifestão pela Sucessivaserie de Cada hum dos Reynados da Monarquia Portuguesa, que Decorrêrãodesde o Governo do Senhor Rey D. João III até o Presente, os Horrorosos Estragos, que a Companhia de Nominada de Jesus Fez em Portugal, e Todos os seus Domínios por Hum Plano, e Systema por Ella Inalteravelmente Seguido desde que Entroun este Reyno, até que Foi delle Proscripta, e Expulsa pela Justa, Sabia, e Providente Ley de 3 de Setembro de 1759*, Vol. 5, Lisboa: Officina de Miguel Manescal da Costa, Impressor do Santo Ofício, 1768.
77. José Eduardo Franco e Cristine Vogel, "As Monita Secreta: Historia de um Best-seller Antijesuitico", *Percursos Florianópolis*, Vol. 4, n.º 1 (Julho 2003), p. 125.
78. Leite Bastos, *O Marquês de Pombal e a Expulsão dos Jesuítas*, Lisboa: Serões Românticos, 1882, p. 5.
79. Paulo Assunção, "O 'Terremoto' Provocado por Sebatião José de Carvalho", *Lusitânia Sacra*, Lisboa, 2ª Série, Tomo XVIII (2006), p. 342.
80. Paulo Assunção, "O 'Terremoto' Provocado por Sebatião José de Carvalho", *Lusitânia Sacra*, Lisboa, 2ª Série, Tomo XVIII (2006), p. 334.

